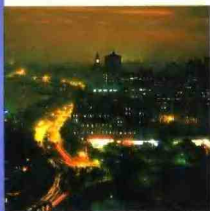


都市人丛书

精明的源流
伟大的“情人墙”
野心不要太大噢
面子·台面·皮子
弄堂与人生

上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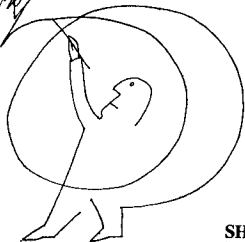
沈善增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SHANGHAIREN

都市

都市人丛书



上海人

SHANGHAIREN

沈善增 著

责任编辑：章 依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谷年

上海人（都市人丛书）

沈善增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17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2.7万 印数 8151—1315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7 213 01176 -6/G · 297 定价：7.80元

海与讲述者

(代序)

上海是个海。

要描述海是很难的，对写作者是一项挑战，一种考验。因为它浩瀚，繁富，气象万千，瞬息万变，深不可测……无论你怎样费尽心机，堆砌词藻，渲染铺张，到头来总让人觉得浮浅，简单，局限，片面，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要评价海则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一代代的墨客骚人，前仆后继，争先恐后，主动来应接这项挑战，承受这份考验。他们对着大海发出阵阵讴歌，发表种种高论，力图把自己的声音铸入永恒的波涛，尽管屡屡收获无尽的惆怅。这些人中，不乏才高八斗、世事洞达的明哲之士，却也不能免俗，不能有彻底的自知之明，不能在大海面前保持“得意忘言”的超然态度。皆因大海这个存在太富于刺激，是观察力、理解力、领悟力与想象力无拘无束、自由驰骋的无垠天地，谁不想在这样广阔的舞台上显一下身手。尤其是在大海的怀抱中诞生成长的人，对海有着特别的感情，哪怕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在讲述的过程中，也能融入自己心底的微妙的情愫，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

块垒；何况“海”这个话题是不可能被前人说尽的，每个与海有很深缘份的人，都会觉得别人对海还说得太少太少，说得精彩的、鞭辟入里的就更少，因此就急吼吼地要挤到讲台上来，争夺话筒，发表一点自认为唯我独有，出自肺腑，惊世骇俗，不吐不快的妙论睿语。说过之后，管别人首肯不首肯，喝采不喝采，他自己觉得，他对于大海的评述将附着于大海而永恒。至少，他没有白白被大海养育，受大海的恩惠。

于是蔚为壮观。一代又一代的表现、湮没……什么都时过境迁，只有无言的大海才真正永恒。

而今轮到我来表演了。登场之前，我就预知所有的努力终究要归于徒劳，但我甚至不能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怀着这种心情的表演者。我相信，在我之前，有许多个比我看得更透的表演者，但他们毕竟还是经不住如此巨大的诱惑。人生本来就是一幕幕连续不断的戏。在哪幕戏中派到一个好角色不容易，谁肯错过这个良机？况且这个角色非常合我的心意，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明知谢幕后什么都没有，我还得使出浑身解数把角色演好。

我不讳言对我养我的上海一往情深。故而，我无法比别的讲述者更超脱，更客观，更公正，更冷静，但我也许能讲得更更有感情，这样，也就免不了会有些偏执。但当我看到电影《老井》把太行山区人民对那一方穷乡僻壤的执著深情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我就感到我作为上海这方水土的儿孙，对故乡及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是表现得太不够了，深自歉疚。对照《老井》这样的文本，我想我是无论怎么写也不会过份的。于是动笔。

目 录

海与讲述者（代序）

上海第一景观.....	(1)
跳出来与钻进去.....	(6)
天下一绝，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	(13)
造上海话难于造长城	(19)
一腔功成，数典忘祖	(25)
我是上海人吗？	(31)
上海人魂系上海话	(37)
上海人与城市化	(43)
精明的源流	(49)
图章与整容术	(54)
“觉新”式心态	(59)
伟大的“情人墙”	(65)
“恋爱角”的遭际	(70)
铁栅栏上的洞	(76)

野心不要太大噢！	(81)
“淘浆糊”闪亮登场	(87)
求新求变与见异思迁	(93)
人情味与面子观	(100)
性本爱“牛山”	(107)
面子·台面·皮子	(115)
形象与实惠	(121)
挤车风景线	(129)
股市与挤车	(135)
上海人出奇兵	(142)
白领意识	(151)
弄堂与人生	(155)
明天的上海人	(161)
现场没有血迹	(164)

上海第一景观

上海第一可观的是人。

是人口使上海坐上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把交椅，并跻身于世界最大都市的行列。

上海除了庞大的在册人口，还有数百万的流动人口。这些外地人乃至外国人，到上海来出差、开会、经营、观光旅游，为上海的繁华风景锦上添花。

作为上海人，我常常在外地的亲朋好友面前由衷地感到惭愧，到上海来，我实在想不出招待他们到哪儿去游览好。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无论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一些名胜古迹。一块光溜溜的大青石也许汉高祖在上面打过盹，一条涓涓细流没准杨贵妃在那儿洗过脸。据说跑到西安、太原，寻常百姓家捧出个喝白开水的瓷碗，也可能有千儿八百年的历史；“秦半两”钱被小孩子随便扔着玩。而此刻在我脚下的上海市区这块寸金之地，据考证，一千几百年前还在海底下。（但我们自小从《乡土教材》中学到，上海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所以又简称“申”。）不管怎么说，上海在自然景观、文化遗迹方面只有自惭形秽的份。上海人引为骄傲

的豫园，初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与毗邻的苏州园林一比，只能拱手称臣。前些日子上海的电视传媒大声疾呼要抢救保护的南市区天灯弄77号“书隐楼”，则是建子乾隆年间的上海市区唯一较为完整的清代住宅。固然砖刻很有特色，但若搬到秦砖汉瓦不稀奇的旧都古城，恐怕是轮不到享受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格的。至于松江的方塔、醉白池，嘉定的汇龙潭、秋霞圃，南翔的古猗园，青浦的曲水园等，虽然都有赏心悦目之处，但地处郊区，景点分散，交通不便，上海市民春秋远游，也宁愿多花些时间与钱财到苏锡杭去，很少光顾那些景点，何况以此来招待远方亲友。

然而最近我到香港去观光旅游一星期以后，那份愧疚感倒减轻了不少。倘若大陆同胞对香港旅游趋之若鹜，那么到上海来游览也是值得的。与香港比起来，上海一样上得了台面，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怎么逊色。的确，香港的现代风格的摩天高楼比上海似乎要多些，但上海近年来高楼盖得也不少，一幢更比一幢高，就像60多年前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与中国银行大楼攀比似的，且一幢更比一幢摩登、漂亮。照此速度，上海的高楼群大概很快能赶上香港，特别是浦东还有那么一大片正在开发的黄金宝地。也许从绝对数字来说，今天上海高楼的数目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香港。但香港没有上海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味的建筑楼群。外滩这个建筑的“万国博览会”，使上海在香港面前显得更有文化底蕴。香港的交通设施要比上海好，市容要比上海清洁，舶来品花色要比上海多，某些商品的价格要比上海便宜，但我相信，只要按现行的“开放、搞活”政策扎扎实实、积极稳妥地搞下去，

上海在这些方面与香港并驾齐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上海人的平均收入高了，腰包鼓了，高档商店里的高档商品自然会多起来，品种、质量、价格自会渐渐和国际接轨。道路畅通了，公交车厢空了，上海人也会变得温文尔雅，在站头上自觉地排队候车。我在香港碰到两位近两年才移民彼方的上海朋友。他们说，在上海抽烟，烟蒂就随手一丢。到了香港，看到马路上那么干净，没有人乱丢杂物，随便吐痰，自己也不好意思污染环境，总要找垃圾箱，已经养成习惯。正巧那天晚上我看电视，新闻中报道两个执法人员逮住了一名乱抛纸屑的男子。香港人称之为“垃圾虫”，最高要课以1万港元的罚款。我当即想到“法不罚众”这句话。在整体环境离清洁优美还有相当的距离，大部分人未能在环境面前形成“污染可耻”的意识，要把这条法律照搬到上海来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都希望自己身处的环境能变得好一些。只要条件成熟，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决不会亚于香港，因为上海人的整体素养本来就不低，对现代文明的吸纳、消化的自觉性与能力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然而，上海的土地开发利用，还不至于像香港那样，到了见缝插针，捉襟见肘的地步。以前在上海，总觉得生存空间的逼仄，到了香港，反感到上海的发展空间还有的是。香港的楼又细又高，像烟囱，又像笔杆，高楼群中，露出小块用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人工草坪，点缀着几条石凳，有几个孩子在里面踢球玩耍。看到这种景象，我觉得香港人在亲近大自然方面的努力，悲壮到了可怜的程度。而热闹到了接近疯狂的跑马场对面，是一片宁静的坟场，一座座肃穆的石碑，每天都要接

受尘世声浪的洗礼，香港人对这奇特的景观似乎已熟视无睹。飞机场则更是与居民稠密的市区近在咫尺，间隔很短的大型客机从街道上空隆隆驶过，周围的住户已经锻炼得对这巨大的噪声充耳不闻。我想，上海明天再发展，大概也不致于窘迫到这种程度。我还到了香港赫赫有名的黄大仙庙，规模与上海昔日的城隍庙都不能比，更别说玉佛寺与龙华寺。一位朋友还热情地驾车请我到新界去游玩，参观了妙法寺与在一座小山上的道观，其规模与黄大仙庙在伯仲之间，跟我前面提及的上海市内及郊区的景点，还不在于一个等级上。有了比较，我对上海也增添了信心。上海可供游览观光的地方还是有，以后我接待外地客人的心态便可以好一些。

回过头来想，上海第一可观的仍然是人，因为上海的一切景观都是人工的产物，都打上了上海人的深深的烙印。东方明珠电视塔、杨浦大桥、南浦大桥、上海商城等宏伟建筑且不说，就说上海唯一的小土丘佘山，可观的是山顶的天主教堂与天文台。当地人犹感对不起仆仆风尘而来的游客，又在山脚下搞了个运用电影声光技术的迷宫。作为上海象征的外滩建筑物，先是采用现代高压水冲洗技术对墙面的百年沉垢进行清洗，继而又用先进的泛光照明技术，使夜幕下的巨堡大厦，显得玲珑剔透，宛若琼楼玉宇。上海人还有本事在弹指之间，叫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乍浦路，变出家家门面金碧辉煌、眩眼夺目的酒楼食府来，形成一条新兴的美食街。人称好莱坞是个制造美国梦的工厂，我看上海人制造繁华美梦的本领，不输给好莱坞的那些电影人。前些年，在追求生活舒适、享乐还不火名正言顺的时候，上海人是关起门

来在自己的窝里造梦。有本事的上海人可以把年久失修的石库门的灶披间装饰得像星级宾馆的高级套房一般豪华，甚至还超越之（譬如用光电感应器控制百页窗帘与室内照明灯的开关等），可以在10来平方的居室里，造成置身于立体声影院中的音响效果。这两年，上海人不过是打开房门，把造梦技术放手大胆地向社会上推广罢了。说上海最可观的是人，就是说上海人的造梦技术已经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因此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上海人移花接木、点铁成金的本领堪称一流。上海人就是特技大师，到上海来就来观赏这位大师的一件件巧夺天工的作品。

故而，要了解上海、描述上海唯有从研究上海人着手才是捷径。文学方面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套用一下，对上海来说，城市即人。你对上海人有了深切的了解，你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走向的把握也八九不离十了。

跳出来与钻进去

对上海人进行研究，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跳出来，使自己具有一定的高度，诸如历史的高度，社会学的高度，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政治经济学的高度等等……找几个参照系，譬如与北京人、广州人作比较，与港澳台同胞作比较，与东京、纽约、鹿特丹、悉尼、莫斯科等大都市的市民作比较，等等，这样作一番宏观的、全面的、纵横捭阖的研究比较，自然把上海人的方方面面的特性都凸现出来了。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货比三家不吃亏，本来是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被熏陶、磨砺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如今“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上海人不原形毕露。

说要让上海人“原形毕露”，是因为我深感到上海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不愿显山露水的成分，为对上海人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漫道是研究上海人，就是一般跟上海人打交道，也一定要“察其言，观其行”。在异地客看来，上海人常常显得心口不一，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有一段距离，因而对上海人怀有戒心。其实上海人并非存心不良，要在交往

过程中赚取乃至骗取些什么东西。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这只是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而已，是一种文化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打交道，一般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日本人见面招呼要毕恭毕敬地鞠躬，这在别国人看来未免礼多而怪，上海的滑稽演员还将此编进节目中，以为笑料，但在日本人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异样感觉的。上海人的性格含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乃至到了让人感到心口不一的程度，上海人自己往往并不察觉，所以成长中的上海人，初次听到外地人众口一辞地认为上海人门槛精，譬如就说30年前的我吧，一下子心里会觉得很冤枉。因为不仅自己作为上海人的一分子，并没有觉得门槛精在何处，反而还常常感到自己很蠢，很无能，屡屡吃亏；而且放眼望去，周围的上海人，祖辈、父辈、同辈，门槛精的还是极少数。极大多数门槛并不精的人合在一起，怎么变成了中国一支门槛很精的人群呢？后来阅历增长了，这类话也听多了，渐渐地虱多不痒，见怪不怪了。更有不少上海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听到外地朋友夸他一句“我看你不像上海人”，高兴得如获皇恩大赦；或者抬出自己的祖籍来（天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到那里去），好像乞儿找到了什么贵族的高贵血统。其实这些以“不像上海人”，“本不是上海人”为荣的上海人，很可能是当年敲锣打鼓办学习班也轰不出上海，或者是在刮回城风时，不惜抛妻别子，写血书，吃麻黄素使血压升高，拚死拚活一定要杀开一条血路回上海来的铁杆好汉；也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之际，因为舍不得上海户口，迈不开腿，下不了闯荡江湖的决心，白白坐失良机的规矩市民；还是心口不一，还

是上海人的脾气。这是血液里的东西，骨髓里的成分，靠几句话能够抹得去吗？

以我的经验与观察，上海人这种含蓄性格的养成，很大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一种防卫的处世姿态。上海是作为一座工商大城市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在现当代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的。而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首先是行政与军事中心，其次才是文化与商业的都会，真可谓先“城”后“市”。哪怕南方商业气息比较强的广州，在清代就是两广总督衙门的署地。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县，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分巡苏松兵备道衙门才移驻上海，上海总算有了个道台老爷，行政级别稍许有所提高。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重农抑商”，“重官轻商”，所以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官老爷面前，一定得谦虚一点，识相一点，如果忘乎所以，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富可敌国”即会变成一条砍脑袋的罪名。与上海有点牵丝攀藤联系的沈万三（贴邻上海的周庄据说现在还留有他家宅院，但据考证这屋子建成之时，沈万三早就命归黄泉，至多也是他家后裔所造），便是一个榜样。就因为在朱元璋筹措军饷时夸了个海口，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鸦片战争以后，租界的开辟，外国资本的长驱直入，中国土生土长的工商业者，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头略微抬高些，腰杆子略微挺直些，稍许改变了一点低头哈腰的奴才相，但离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尚有很大距离，趾高气扬则更不谈了。毛泽东同志早就对此下过结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从传统商贾到近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以一贯之的软弱性，构成了上海人文化性格含蓄的深层原因。一个成熟的

上海人，不喜欢出风头，图虚名，而喜欢捞实惠。电影《地道战》里日本小队长一句普通的台词：“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当初放映的时候，就引起观看的男女老少会心的笑声，立刻在学生仔的口头流传开来，一直传到今天。有许多人已经忘了这部电影，却记住了这句话，皆因它搔到了上海人心头的痒处。

在这方面，上海人与北京人的性格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似乎可以为我的这种个人看法提供一条佐证（也许这样措词本身就相当上海式）。北京人有一种天子脚下——等臣民的天然的优越感，对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喜欢张张扬扬，咋咋呼呼，好像都是什么空前绝后、了不得的东西似的。一碗再寒碜不过的大碗茶，也有勇气编成歌满世界地唱，有唱得人含馋欲滴的自信心，更不用说什么老十大建筑，新几大建筑等等了。在上海人看来，北京人是显摆得太无顾忌了。他们也应该毫无顾忌。首都嘛，跟别的城市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搞得辉煌是理所当然的事，体现整个国家的荣耀，谁还能嫉妒吗？让你对首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也是给你的一份光荣，例如进京参加重大工程的设计、建造，晋京献演，参展等，你高兴还来不及，还能嘀咕吗？所以上海人最多有时觉得北京人神气过了头，神气得俗了，或者有点仗势欺人，欺世盗名了，但对北京人能神气、应该神气的那份资格从心底里是认同的，更是不敢望其项背，步其后尘的。上海这两年也开始宣传“三年大变样”的成就，但在宣传上特别注意的是掌握分寸感。这种分寸感也并不需要有关宣传部门、传播媒介的采编人员格外去留意，每个有机会公开发表意见、看

法的上海人，上自市长、下至普通市民，都会自觉地掌握好这种分寸，因为上海人的血液里不仅没有什么狂傲的成分，而且还有对狂傲的免疫抗体，唯恐被人留下狂傲的印象。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台冠名为“三年大变样中的上海人”的电视晚会，晚会中有个小品，一个小伙子到店里去买皮鞋，让营业员换拿了几次，每换拿一次，小伙子都要一叠声地说：“对不起”，“谢谢”，“不好意思”，而营业员则而无表情地默然应之。小品演出后，现场观众在主持人采访时说是“顾客与营业员换错了位置”，“一个日本（式）顾客碰到了一个中国营业员”，有个红领巾还统计出那顾客共说了多少个“对不起”，多少个“谢谢”。只有老电影演员陈述先生说了句大实话：“我觉得这个营业员还是不错的。”小品固然夸张了些，但恐怕每个成年的上海人都有谦恭地向着营业员陪笑脸的经验，包括那些营业员，当他们换成顾客角色时，一样会彬彬有礼起来。上海人不要说做“上帝”，连当“贵族”也不敢。改革、开放后，营业员的态度有所改变，热情的笑脸、主动的招呼多了起来，但上海人看到这种迎上来的笑脸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怕笑里藏刀，怕买卖不成会遭白眼，故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其实这怕那怕都是表面理由，推敲起来站不住脚的，骨子里还是那种平民情结。上海人，哪怕极其普通的市民，在说到近三年所取得的成就时，都不忘首先感谢全国人民对上海的支持，或者末后不忘补充一句感谢全国人民支持之类的话。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能体会到绝大多数同乡在说这句话时十分真诚。但我觉得，倘换一个角度，在一个外地人听来，也许会感到这样强调，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至少觉